

# 论蒲松龄的儒学思想和鬼神观念

郭迎晖

(浙江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8)

**摘要:**蒲松龄基本哲学观点及其宗教鬼神观念具有矛盾性。宗教鬼神不过是借之发愤的手段,蒲氏对宗教鬼神有似信复疑的态度。虽然抱着济世的儒家思想,而现实又迫使蒲氏对儒家的思想道德产生了怀疑。作品中表现了他冀求恢复科举的健康机能,以实现其“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思想,但出于个人不平遭际,又对科举强烈批判;受明中叶以来反对程朱理学的社会思潮影响,蒲氏作品表现出反礼教、反传统的新型道德观念。

**关键词:**蒲松龄;儒家思想;鬼神观念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06)01-0102-04

蒲松龄思想的矛盾性贯其一生。在《聊斋志异》及其他著述中,我们不难看到其思想矛盾性的表现:他既崇信宗教、迷信鬼神,又对神佛三心二意,对鬼神的客观存在持怀疑态度;既是儒家思想道德自始至终的追随者、现存制度的维护者,又是受新的社会思潮影响,对黑暗现实深恶痛绝的批判者。如果要对蒲松龄思想的矛盾性进行统一观照,有必要分析他的基本哲学观点。

—

蒲松龄的《会天意序》<sup>[1]</sup>(《聊斋文集》卷三)一文集中体现了他对“天人关系”的看法,对宇宙本体的认识。“欲知天地之始终,不于天地间求之,得之于方寸中耳。方寸中之天地,不可以见见,不可以闻闻。不见不稳,空空静静,冥而守之,与元始合其真。”他认为,如果能“凝神默会”地以“心”去体认“天”,那么,“天”的一切变化和现象,就会化在“心”中。这些变化和现象,不过是证明了“心”的存在,而要认识“天”,是不可能通过感官来发现的,必须使“本心”处于“空”、“静”的状态,才可以使“心”与“元始”合而为一。由此可见,蒲松龄的这一看法,恰恰印证了陆九渊“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的

观点,也与王阳明的“以心为世界的本体,为天地鬼神的主宰”的“心学”一脉相传,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本体论。

基于这一本体论,蒲松龄笃信天人合一、神人感应。“所以天地之常变,人事之得失,两相征验。一念善,即应景星庆云;一念恶,即应飞流孛慧;一念喜,即应和风甘雨;一念怒,即应疾雷严霜。”(《会天意序》)“心”从根本上说是“天地大化”的本源;从社会实际行动上说,又是“千幻并作”的动源。故蒲松龄融合禅宗万法唯心思想并反其道而用之,提出了“幻由人生”。“幻由人生,此言类有道者。人有淫心,是生亵境;人有亵心,是生怖境。菩萨点化愚蒙,千幻并作,皆人心所自动耳。”<sup>[2]</sup>(《聊斋志异》之《画壁》)人心的“幻化”可以产生超人间的力量,从而赋予作者自由度极大的创作空间。联系《聊斋志异》中那个多姿多彩的宗教鬼神世界,我们不难理解蒲松龄的宗教鬼神观如此复杂的原因。

《聊斋志异》一书中除少数篇章(例:《乐仲》、《长清僧》、《贾奉雉》、《城仙》等)体现着较正统的宗教观念外,大部分篇章则呈现多元的混融状态。《钟生》中,钟生以“至孝”一念而得道仙相助,危难之时又由老僧解其灾难,是道、佛思想的相融;而汤公在灵魂渺渺无所归之际,相继拜见了孔圣(儒)、文畅帝

君(道)、菩萨(释),经菩萨施法,还魂为人(《汤公》),则是儒释道三教合作的典范。而且,全书的宗教色彩不仅是三教的相互融合,还包含了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多神崇拜等多种宗教现象。花神、水神、青蛙神、狐仙等等这些在正统文学中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形象频频出现,为《聊斋志异》一书增添了丰富的内容、色彩斑斓的亮点,产生了独具魅力的情感效果。这固然与作者对宗教的从众心态有关,也是和中国宗教特有的兼容性、作者题材特有的广泛性分不开的。

但是,对于宗教鬼神,《聊斋志异》中不仅表现出了多元混融性,而且表现出了二重性。即蒲松龄并不是一个彻头彻尾迷信宗教鬼神的人,他笔下的神鬼不过是他“幻化人生”的手段,佛道思想也不过是他的哲学武器。从路大荒先生《蒲松龄》集中的杂著来看,集中直接记载了多次的民间神佛崇拜活动,许多文章是为募修各路神灵的庙、殿、祠、阁或为重塑、修复、请遣神像而撰写的。然而,蒲松龄的创作心态却不尽统一。从《王村募修地藏王殿序》“盖以斋心讽吹,是谓善根,建刹修桥,厥名福业。三生种福,沾逮儿孙;一佛升天,拔及父母;所谓无有际岸功德,具慧性者所不疑也”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因果报应的笃信;从“夫药王者或谓即神农氏”,“是邪非耶,俱未可知”(《栖王桥募修药王殿序》),“(东岳储君之庙)一望荒草,非惟亵神,观瞻亦恶……村中善士乞余一言,余何难为顺风之一呼也?”(《王村重修炳灵庙募缘序》)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他的从众、应酬的心态;而《圣水沟募修大殿序》“无论圣母其谁欤,其灵感与否”不重要,但“千年之故迹,一邑之佳胜,不能增其壮丽,亦不可听其倾圮也”中,根本看不出蒲松龄对神道的虔诚,反而体现的是他出于审美考虑的心态。这些纪实性的文章,充分表达了蒲氏“缘来缘去信亦疑”的宗教矛盾。这一点也可以从《聊斋》中有的篇章上看出。《龙戏珠》中廉正爱民的徐公却惨遭雷击。文中叹道:“闻雷霆之击,必于凶人,奈何以循良之吏,罹此惨毒?天公之愦愦,不已多乎?”直斥天道的不公。《魁星》中张家降临魁星,却未主文运,反使家道中落,又直指神道的不灵。更加耐人寻味的是《西僧》一篇,西僧东来,东僧西游,异地求佛,徒劳往返。其意蕴颇与禅宗相似,六祖慧能曾言:“东方

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又求生何国?凡愚不了自性,不识身中净土,愿东愿西,悟人,在此一般,所以佛言随所住处恒安乐。”<sup>[3]</sup>(《坛经·疑问品》)恰正是蒲氏佛性即是自心的真实观点。

应该指出的是,虽然蒲氏受佛道思想影响很大,但其作品却显现出了一定的媚俗性。《西湖主》中陈生分身有术地逍遥于人间、仙境两个境界,既长生不老,兼得声色豪奢。“一身而两享其奉”;《乐仲》中乐仲、琼华成仙后,仍不忘家嗣香烟,为子孙争取田产;《城隍》中的周生,口喊“忍事最乐”,得道后却又给儿孙寄来可以点金的爪甲。在成仙成佛与实现现实人生价值之间,作者情感的天平倒向了后者。

## 二

在蒲松龄笔下,“儒”已成了一种与佛、道相提并论的宗教。“佛曰‘虚无’,老曰‘清净’,儒曰‘克复’,至于教忠教孝,则殊途同归。”(《王如水<问心集>跋》)正因为在其文学作品中,蒲松龄没有把重心放在治国、平天下的方案上,更多地放在了具体的个人“修身”、“治心”上面,所以,他所要求的“忠恕心”、“仁孝心”、“戒惧心”、“菩提心”,使他的儒释教义相联系。(例如儒家天命论与释家宿命论;儒家惩恶扬善与释家因果报应等等)形成了“神道设教”。《聊斋》中就有大量劝方正、劝仁孝、劝善、劝本分的篇目。

值得注意的是,蒲松龄对待儒、释、道三教并存,一直是坚持以儒为宗的。虽然蒲松龄在《聊斋自志》中怀疑自己的前生即为“先大人”所梦的“病瘠瞿昙”,但这并不能说明蒲氏默认了自己的命蹇运乖,也不能说明他的佛(包括道)宗教意识缘于“三生石上,顿悟前因”。沉重的社会苦难、残酷的社会现实,才是使他遁入宗教的原因。从其人生观、价值取向、关注人生的态度上看,蒲氏的主要哲学武器仍是儒家思想。蒲松龄复杂的宗教鬼神观念,一方面奠定在他主观唯心主义“幻由人生”的哲学观点上,另一方面则为了服从儒家思想(心学)教化的需要。也可以说,对于宗教鬼神,蒲松龄肯定的是它的教化作用,而不是虚无缥缈的宗教鬼神本身。他抱着姑妄言之的心态,把客观现实幻化于鬼神之中,其寓意远

远超出了鬼神的形式,有利于儒家教化的则信;否之则疑。

作为儒家的忠实信徒,蒲氏也曾怀有积极用世的政治愿望,希望改变现实,施行仁政,利人济物:赋役征收,应当“念民膏”;刑名出入,应当“得民情”;工役兴作,应当“惜民力”。(《代孙蕙作<放生池碑记>》)而要想实现“仁政”,就要靠圣君贤臣。

拿蒲松龄《聊斋志异》关于科举的文章来说,蒲氏把对科举的批判,集中在“夤缘幸进者在在皆是”,科场舞弊、贪污贿赂和考官的目不识文、素质低劣上,而并没有否定科举制度本身,相信只要清除科场蠹虫,起用公正廉明的考官,就可以恢复科举的健康机能。而且他更为看中的是,通过科考,可以使他的个体价值得到认可,进一步实现其“学而优则仕”的儒家理想。所以尽管对科举深恶痛绝,不遗余力地批判,蒲松龄一生积极进取,不忘科举,到72岁高龄时,还不惜冲风冒雪,到青州府去考贡,总算博得了岁贡功名,他随后在《蒙朋赐贺》诗中写到:“落拓功名五十秋,不成一事雪盈头。腐儒也得宾朋贺,归对妻孥梦也羞。”——这足以证明,蒲松龄现实生活中始终是抱着“中和”的儒家心态,怀有入世济世精神的。《聊斋文集》卷十一、十二中,保存了蒲氏所写的拟表七十九通,是他为准备科举考试所作的“敲门砖”,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所推崇的政治措施,看到他对封建最高统治者的殷切希望。

蒲氏以孟子“得志,泽加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为价值取向,如,他写有《为人要则》内列“正心”、“立身”、“重信”、“劝善”等十二则,这些正心修身的理论,正是仁义礼智信的具体化。其《聊斋》虽为孤愤之书,但仍是“以不涉怨尤之怀,不伤忠孝之旨”<sup>[4]</sup> [纪昀·纪文公遗集(卷九),四库从刊本]为准则的。集中大量劝仁孝、劝方正、劝善、劝本分的篇目就是证明。

### 三

《聊斋志异》所批判的“文运颠倒”,机锋所在虽在考官等科场要人,而其实质乃是揭露八股取士对人们思想的窒息,是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的。像《叶生》中的叶生,他才名冠世,却久困名场,死后还不忘

为文章吐气。这一悲剧颇具普遍性。封建科举制度对人才的扼杀,蒲松龄并不是没有看到,而他对科举的既欣羡又憎恶的矛盾心态,却始终得不到化解。就是他深为信仰的儒家思想,他又何尝没有质疑?

新兴的人文主义民主思潮的影响,使得儒家思想在蒲松龄心中根深蒂固的地位动摇了,他所竭力维护的传统道德、伦理已不能律人淑世了,现实与理想的矛盾,怀才不遇的愤懑,激发了他的批判精神。“世无知己,则顿足欲骂;感于民情,则怆恻欲泣,利与害非所计及也。”(《聊斋诗集·喜之德采芹》)透过作者的“幻化”之笔,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他填膺的“孤愤”。

从“感于民情”方面来说,抱着对受压迫的社会底层人民的深切同情,蒲氏的文学作品把揭露的对象从吏扩大到官、王甚至天子。他对社会黑暗的清醒认识,对贪官污吏的挞伐,已超出了维护统治阶级根本利益之上的讽君、刺贪虐。因为“宫中尚促织之戏”,便导致乡里细民家破人亡、贴妇买儿(《促织》);冯生以一言之微得罪楚银台之子,竟致入狱,几至杀身(《辛十四娘》);……与那些善良的被压迫的人们相比,“贪吏似狱,亦且揣民之肥瘠而志之,而裂食之”(《黑兽》);“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梦狼》)。与此同时,《聊斋志异》塑造了一系列反抗者的形象,表现了人民群众反对压迫的斗争精神,作者本人对邪恶势力的深恶痛绝。何向杲化虎吃掉仇人(《向杲》);梅女变成厉鬼向贪官索魂(《梅女》),对于杀死恶吏的王鼎,蒲氏甚至直接指出:“余每欲上言定律:凡杀公役者,罪减平人三等。盖此辈无有不可杀者也”(《伍秋月》)。——这已不是儒家“温柔敦厚”的中和态度所涵盖得了的了。

再从“世无知己”方面来说,“世上何人解怜才,投珠犹使世人猜”(《聊斋志异·访途济宇不遇》)。蒲松龄孜孜汲汲地竞奔科场,一直希望通过科举,使自己的个体生命价值得到社会承认,然而,才华出众、久困名场使他的心灵造成分裂,怀着强烈的愤懑之情揭露批判八股取士对人们思想的窒息、对人才的扼杀。在求告无门的价值失落感下,蒲氏不得不在虚拟的理想境界中寻求个体价值的自我实现。于是“香草美人”的传统成为了他满足知己知遇之感的手段。借助浪漫主义的幻想,互相尊重、互为知己的男女之

情被高度赞扬。从《聊斋》中的《白秋练》、《连琐》、《小谢》、《香玉》等篇中,我们可以看到,“红颜知己”这一类狐女、神女的出现,是对传统才子佳人故事的冲击力量。

此外,在爱情、婚姻观上,蒲氏歌颂男女的真情,蔑视礼法名教的束缚。“天下惟真才人为能多情”(《端云》);“礼缘情制;情之所以在,异族和殊焉!”(《素秋》)——公开地反对“以礼节情”的传统礼教观念,提倡自媒自主的婚姻。这种因情制礼的主张,体现了自陆王心学以来的时代精神。

由以上的几点可知,虽然蒲松龄是儒家思想自始至终的追随者,但受他本人生活遭际的不平经历和新兴的社会思潮的影响,使他的文学作品有了超脱儒家传统伦理道德束缚的积极倾向。而他所处的新旧两种社会意识冲突的特殊时期,又使他的思想道德始终徘徊在二者之间,显示出了一定的矛盾性。

这种看不见出路的苦闷与矛盾,又诱发了他利用“幻化”,以超现实的手段来完成他对社会罪恶的批判和否定,与他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观点、神道设教的思想统一在一起。

所以,蒲松龄在其文学作品《聊斋志异》中表现出来的宗教鬼神思想,是不同于其它志怪小说的。“遄飞逸兴,狂固难辞;永托旷怀,痴且不讳”(《聊斋自志》),饱含了作者的情志,抒写孤愤的审美追求。而《聊斋》思想内容如此之深刻,艺术成就如此之突出,正是由于蒲氏思想中不可自拔的矛盾造成的。

#### 参考文献:

- [1]路大荒.蒲松龄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 [2]朱其铠. (清)蒲松龄《全本新注聊斋志异》[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9.
- [3]郭朋. (唐)慧能《坛经》校释 [M].北京:中华书局, 1983

## A Review of Pu Songling's Confucianism and Demonology

GUO YING-HUI

(School of Humanit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inconsistencies between Pu songling's basic attitude of philosophy and demonology. In his viewpoint, he just resorted to the demon, and abreaction was his real purpose. Pu songling's suspicion to the Demonology lies on his contradiction in terms. The practice made Pu songling threw doubt upon the Confucianism, though he had a salvation attitude, which he accepted from the Confucianism. He had a dream that maybe some day he could serve the Emperor due to his abundant knowledge. So in his works he expressed his willing of rescuing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through which he could actualize his dream. But on the contrary he deprecate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for his unjustice received from it. Influenced by the thought which was antirationalist started from middle period of Ming Dynasty, his works expressed a new type morality, and that was antiethic and antitradition.

**Key words** Pu songling; confucianism; demonology